

新维度 新路向

——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期待

鲁枢元

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其隐身于后台的理念即所谓现代性。多年来，“现代性反思”始终是西方知识界的核心话题，一种乐观的看法是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如信息系统技术的全球扩张、金融体系凌空蹈虚的自行其是、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广泛影响，一个不同于现行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即将诞生，或者已经开始降临，那就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场新的游戏，必然要推出一系列新的规则。

这可以视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说法。

但我们也可以做出另一种猜测：现代社会结构形态某些世界性的拓展与变化，并未招致现代社会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的改变，如持续发展进步的社会理念与资本无限累积增殖的价值观念。所谓全球化，实则不过是现代性自身逻辑在整个地球上的进一步扩张与增强。人们尽可以举出现代社会遭遇到的种种困境与噩梦、陷阱与危机，由启蒙运动开创的这个社会体制似乎已经走向终结，但这或许只是一种误判。

或许，旧体制倒像太上老君炼丹炉里遭遇厄运的孙猴子，不但没有被“终结”，反而被高温毒焰炼出一副火眼金睛、铜头铁臂，成为刀枪不入的“巨人”与“超人”。可惜这只“泼猴”远非善类，头上也缺少观世音菩萨施加的紧箍咒，神通的增强只能加大世界的风险。接下来的一台“新西游记”，将更加令人忧虑。

如果真有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新社会”，那就应当是一个能够跳出“发展迷思”与“资本逻辑”的社会模式，是在“颠覆”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形态。在我看来，那就是生态社会。

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弊端与险象，生态社会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但我又深

深怀疑，这样的社会真的是可以期待的吗？

一、资本与自然

当年我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设置下“资本主义是地球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的标题时，内心曾久久感到忐忑不安。15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个标题，我反而更踏实了，只是希望再补充一些话：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设计最科学、运转最高效，世界上没有哪种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成功，只有资本主义才能造就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的别的制度连一半都做不到。^[1]这段话出自所谓“世界级经济问题权威、宏观经济学专家”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之口，有自诩之嫌，却倒也基本符合事实。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核心概念，其传统表现形式为机器、厂房、原料、商品，如今又加上技术、信息等，但最后统筹的形式则是货币，或曰金钱。资本的生命在于利润最大化，在追逐利润亦即金钱的过程中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资本拥有无上的支配权，对物的支配权连带着对人的支配权，乃至对于人的灵魂的支配权，即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资本对物的支配权，则集中表现在对于自然的支配。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于“自然”的全力开发与无度掠夺之上的。制度的最初设计师如牛顿、培根、笛卡尔，从一开始就把自然放在这个社会的对立面，当做外在于人的、可以永远为这个社会提供福利的资源。有人把资本主义的这一核心理念概括为六个字：擅理智，役自然。^[2]就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人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300年的历史亦即世界“现代化”的进程。300年间，人类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向自然进军，向自然索取，开发自然，改造自然，一心一意地要为自己建造起人间天堂，这条轰轰烈烈的道路一直延续到今天。

人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大自然攻掠式的无度开发，已经大大损耗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污染了人类及其他生命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的生活酿下严重危机。

为“人性”所规定的人类生活本来是拥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人类是万物之灵，拥有认识、改造自然的理性和手段；另一方面，人类又是地球生物圈生命网络中的一环，地

[1]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 [美]艾恺（Guy S.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球众多物种中的一员，注定要生活在相应的自然环境中。在过去的三个多世纪中，人类被征服自然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忘记了第二点，忘记了自己和自然血肉相连的关系，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几乎在人类取得胜利的所有方面人类都同时踏入了自然的陷阱。

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及由此引发的对于自然生态的损伤，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开端，而是从人类具备独立意识、掌握了工具制造和火的利用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个过程的进展一直是缓慢的，对自然的破坏是局部的、浅表的，仍在地球生物圈可承受范围之内。对地球生态系统大规模、全方位、深层次的破坏，却是近三百年来事，生态危机、环境恶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普及而急遽蔓延开来。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的胜利进军，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之物却在迅速走向死亡。由此看来，说“资本主义是地球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并不为过。

第二，我是试图在超越意识形态之上作出这一判断的。社会主义与其对立面资本主义，其实是启蒙理性同一条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是在同一条现代化轨道上奔跑的两列车，意识形态不同，在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寻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取向上没有什么不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更是别无二致。即使在它们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血肉相拼之际，各自对于自然的攻掠也不曾放松。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兴无灭资”大力摧毁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同时，又打响“战天斗地”、向“自然进军”的战役。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豪情万丈的无产阶级比起精细多虑的资产阶级更加无所顾忌，“大炼钢铁”一举烧光了国土上的大片森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观念不断进步，不再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不管“黑猫”、“白猫”，逮住 GDP（以货币标注的资本总额）这个“老鼠”的就是好“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无论是名分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接受西方贸易政策法规的监督和管理，参与全球市场与金融领域的合作与竞争，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且不说国内“引资”、“融资”、“集资”名号下的种种黑幕与潜规则）。在“落后就要挨打”潜在心理的支配下，中国人充分发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的经济跃升到一个举世瞩目的高度，并顺理成章地将资本的触角伸向海外。当然，成本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便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大量损耗，难以恢复的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其深度与烈度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

需要补充的第三点是，与资本相对的自然，不仅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外在自然，即“自然界”、“大自然”；也还有人的“内在自然”，即所谓“人的天性”、“人的自然性”。给人类灵魂造成最大伤害与给自然生态造成最大伤害的是同一件东西：现代资本的经营模式，即高速运转着的货币流。

马克思侧重于从资本家对于工人盘剥的层面揭露资本拥有者对于无产者“自然天性”的戕害：“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劳动者被异化的悲惨命运，在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雨果、狄更斯、左拉的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精英，也以此为鉴调节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以避免无产阶级革命持续发生。

人的“内在天性”的异化同时也发生在资产者身上。舍勒更善于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上揭示资产者人格结构的病变，他认为，资产者的心理是一种扭曲的、癫狂般的变态心理，已非人的正常天性。他们是实干的，又是冒险的，是富于进取的，又是勇于掠夺的，他们怀着强烈的盈利欲望，又具备精密的算计心理，同时还拥有支配他人与自然的顽强意志。正是这样一批人，成了一个社会中“经济生活的带头人”。进而，资产者把他们的心理素质、价值偏爱、生活方式演变成一种时代精神、世界潮流，并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他的敌对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里，正在顺畅地将其扩散到地球上人群居住的各个角落，侵染到人类信仰、伦理、审美、性别、教育的各个方面。

当代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后一路凯歌高奏之际，不料从天而降的一个敌手，竟是“自然”。“自然”正试图对这只“资本泼猴”套上“紧箍咒”，一切“发展进步”的社会理念在“生态危机”的黑洞前都不得不作出反思。一切违背自然、敌视自然的文明都将付出最终的代价。德国杰出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早在100年前就指出：“所有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死亡的病菌”，这里“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2]上一个悲剧是古代罗马的贵族文化，如今，先天敌视自然的资本文化有可能逃脱悲剧的命运吗？

“鱼在水中生活最容易忽略的是湿润”，人在其社会生活中最容易忽略的是自然。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被现代社会长期忽略的“自然”，正在作为一个新的维度，以无比威严的姿态横陈在所有地球人面前。

二、全球化与人类纪

“全球化”好像是在圆人们一个美好的梦幻，即整个地球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在中国近代圣人康有为笔下是“大同世界”，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信念里是“国际共运”，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1页。

[2]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在毛泽东那里是“让红旗插遍五洲四海”、“全球同此凉热”。新世纪以来，真正把全世界的无产者、有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反倒是诸如“摩托罗拉”、“苹果”之类的手机与电脑。

“全球化”的核心要义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与市场的完美组合正在以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方式改造全球体制，构建世界新秩序，跨国公司与世界金融机构正在波澜壮阔地将同一种价值观念、同一种生存模式推向全球。“全球化”被视为人类社会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带有主导性的进程，被视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样式。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在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开篇指出，新的时代将制定出“新规则”和“新策略”、“胜利将属于那些学会参与新赛局的人们”。^[1]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指出，“全球化”也将变成新的“思想的游戏地带”。^[2]

但也有不少人对于全球化的这种划时代之新持保留乃至对抗态度，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资本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制度化”。在这个“新时代”里，尽管地域被网络取代、权力专制被商品控制替补、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剥离、民族国家开始被跨国市场消解，但资本的逻辑、发展的信条作为游戏的平台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而是被强化、被拓展了。全球化就是资本在全球“狩猎”、“套利”的自由化。电子计算机的全球联网，则又使“资本”能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突袭或者闪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先进的信息技术赋予跨国公司纵横捭阖的高度自由，由于跨国公司迅速积累起真正“富可敌国”的财力，时间的阻隔、地域的阻隔在跨国资本面前霎时间化为云烟；那些千百年来统治严密、封闭牢固的民族国家，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信念与尊严，自动地打开关口，迎接资本的入侵。全球化实质上又不能不是变相的殖民化，受新殖民者控制的所谓“欠发展国家”，在失去自己传统的有机生活模式之后，终究不能挤进发达国家的行列，其中大多数正在充满繁荣富强的美梦中一天天走向败落与混乱。

“资本”作为征服全球的现代战神，这次使用的武器不再是当年拿破仑、希特勒的“铁与火”，而是“消费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温和而舒适，然而，也更彻底。由全球化推进的狂热的全球性消费浪潮，正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消解掉地球亿万年来集聚下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同时也销蚀掉人类社会千百年来赖以维继的文化精神与传统美德。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涵盖了形形色色共产主义制度设计者的部分“崇高”理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物质产品的极大富裕、资源与生产力的统

[1]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 [美]罗兰·罗伯逊：《为全球化定位：全球化作为中心概念》，见杨展编选：《全球化话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一调配、以人为本的劳动者的有序自由组合以及科层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于是，这一由资本运作将启蒙理性贯穿始终的全球化得到了多数地球人的赞同和拥护。有人以素朴直白的语句概括了如此全球化的核心价值与逻辑原理：“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全球资本主义的计划是：劝说人们进行超出他们‘生理需求’的消费；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积累永久进行下去，以聚敛私有利润。”“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宣称，生活的意义就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中。因此，消费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生机和活力，而要保持生机和活力，我们就得不停地消费下去。”^[1]

在生产与消费这个最基本的游戏平台上，资本的全球化与原初的资本主义并无区别。问题在于随着地球人口的迅速增加，随着现代人消费胃口的日益扩张，地球上这个有限存在的“生物圈”已经承受不了，呈现出种种破损、断裂、崩溃的危险。打一个比方，就像一群贪吃的大象突然涌进一座面积有限的香蕉园，吃喝拉撒、肆意踩踏，这座生机盎然的绿色园林很快就濒临崩溃。

同样的原理，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资源生态学教授威廉·里斯（William E.Rees）提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生态足迹通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如土地与水域）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耕地面积，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因此它可以形象地被理解成现代人类的一双“大脚”对自然的践踏。通过测量这只大脚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大小，便可得出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人类对生态资源侵占与损坏的程度。

生态足迹取决于这一地区的人口规模、物质生活水平、技术条件和生态生产力。研究表明，当前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 2.8hm^2 ，而可利用生物生产面积仅为 2hm^2 ，全球人均生态赤字 0.8hm^2 。为了让各个国家在自然资源占用方面“有账可查”，200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2004地球生态报告》使用了“生态足迹”这一指标，并列出了第一份“大脚黑名单”。在这份“大脚黑名单”上，阿联酋以其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近乎疯狂的石油开采“荣登榜首”——人均生态足迹达 9.9hm^2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5倍；美国、科威特紧随其后，以人均生态足迹 9.5hm^2 位居第二。贫困的阿富汗则以人均 0.3hm^2 生态足迹位居最后。报告显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韩国均是生态赤字很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全球大锅饭”中，这些“发达国家”多吃多占了属于别人的口粮。就在那些生态盈余的欠发达国家居民为全球生态环境作出贡献时，发达国家正在以难以持续的极端水平消耗着生态资源。“美国化”实际上已经被作为“全

[1]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球化”的模板。专家们指出：如果全球的居民都达到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准，人类将需要5个或更多个地球。

遗憾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何推行“全球化”，就不能忽略“生态足迹”的践行效应，不能无视“自然维度”的存在。《报告》的主要作者、生态学家骆乔森（Jonathan Loh）说：很简单，如果生态足迹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从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的立场审视现行的全球化，结论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也是缺失正义与公平的。

相对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全球化”，我们似乎应当更关心一个以“生态养护”为核心的用语。那就是“人类纪”。

一个来自科学界的最新判断：地球已经进入它的另一个发展时期——“人类纪”。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两位科学家：一位是诺贝尔奖得主鲍尔·克鲁岑（Paul Crutzen），一位是地壳与生物圈研究国际计划领导人兼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执行主任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在他们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力，人类单凭着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改变着这个星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人类纪”与以往人们熟知的“寒武纪”、“泥盆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相比，本该是一个地质学的术语，然而在今天，“人类纪”已经涵盖了地球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关联的各个方面，覆盖了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共同面对的经济、政治、安全、教育、文化、信仰等全部问题。在“人类纪”时代，人类的每一项重大活动，都将引发全球环境与国际社会的剧烈震荡。“人类纪”已经远不仅是一个地质科学概念，同时也成了一个人文学科概念，一个跨越了人与自然的多学科概念，一个全体地球人类都必须密切关注的整体性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种充盈着浓郁生态意味的“全球化”，一种全体地球人类都必须平等面对的“全球化”。而目前世界上主流话语称颂的那个“全球化”，实际上是跨国资本市场对全球的占领，是美国式或“仿美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向全球的扩张。这是一种充满了暴力与霸权气息的“全球化”。

应当以“人类纪”的冷静思索取代“全球化”的狂热宣传。

三、后现代与生态时代

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首先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从而向人们昭示了在工业社会高速发展300年后，已出现一个异样的社会形态：“后现代”。

“后现代”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问题团块”。关于这个社会的命名，就曾

经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市场社会”、“后消费社会”、“后福利社会”、“后匮乏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超工业社会”、“电子技术社会”、“信息社会”、“知识价值社会”等五花八门的说法。如今，关于“后现代”的众说纷纭已大体归结到统一的认识，即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说法：“全球化”与“后现代”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就是后现代化”。^[1]

面对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轴心”的后现代，学界又有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前者的代表人物可推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那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代“阶级斗争”成了推动社会进步、集体富裕的力量源泉，成了一个社会合理、合法存在的基础。“工具理性”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种种弊端，都可以通过“公共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和人、国和国、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理性交往”加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世界理性化的构建逐步渡过难关，走向进一步的完美、完善。这位早年曾寄身法兰克福学派的人物，如今一反马尔库塞狂飙斗士形象，变成后期资本主义制度的“裱糊匠”。

悲观派的代表，可推徜徉于诗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他看来，“发展”，已经发展出太多违背自然和人性的东西。技术革新以一种“性恶论”为基础，进入无限发展的角逐中。这种角逐甚至也已经侵入了文学艺术领域，市场的冲动取代了创作的冲动，“公共的空间被转化为一个文化商品市场，其中，‘新’变成剩余价值的新的资源。”他站在左翼对抗立场上将“后现代”视为“现代”的继续，并试图从解构西方文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着手，为所谓的社会持续发展敲响丧钟。利奥塔倾向于把人类在这条道路上的毁灭性进军看做是地球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熵”的表现形式。在地球毁灭之际，在人类“大逃亡的飞船上掌舵的仍将是熵”，^[2]拯救几乎是无望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到所谓“后工业”、“后现代”阶段，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遭遇到真正的“山穷水尽”。人类社会如果难以再“照直前进”，那么历史也许就到了该“转弯”、“改道”的时刻。工业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或许不是工业社会的延续发展，而是一个超越了现状的新社会、新时代。在人类精神的上空，已经隐约飘来一缕祥云，那就是关于“生态时代”的预测。

1985年，当我还正在热衷于文艺心理学研究时，我读到了《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的文章，署名是E.拉兹洛（Ervin

[1]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2]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Laszlo)。当时，关于 E. 拉兹洛，我尚且一无所知。多年以后，当我转向生态文艺学研究时，才知道他原来是罗马俱乐部以及后来的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一位著述甚丰的学者，一位功底深厚的钢琴演奏家。拉兹洛明确提出“后现代”是“人类生态学时代”：目前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一个过渡的时代，也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度过这个时期，“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一个更具有承受力和更公正的时代。那时，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可以预见的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1]在他看来，在工业时代之后的这个“生态学时代”里，人们对权利和财富的角逐将受到抑制，人类对地球的压力将由此得到缓解，审美的、象征性的价值将重新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也将由此得以提高。“后现代的生态时代”应该是一个“人间盛世”。

继之，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教授开始将“生态时代”植入其“建设性后现代”的研究领域。他的本职工作是“神学教授”，因此他更看重“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认为：即将来临的社会是一个既有别于前现代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将走出经济利益的狭窄牢笼，将摆脱机械思想对于人的控制，“人的福祉”将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回归。

拉兹洛与格里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文化因素、精神因素置入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之中，为“生态学”及“后现代学”输入新鲜血液同时，也使“生态学”闪烁出精神的光辉，为“后现代”的理论点染上理想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生态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走出生物学的局限，持续开始了它的“人文化转向”。近数十年中，生态学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神学、美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同时又把自己的思想渗透进这些学科领域。正如我国生态学家牛文元教授指出的：20 世纪末叶的生态学已经“以哲学语言代替了自然语言”，“由深层解析置换了表象描述”，“由二元分离复归到一元本体”，“由被动追随到强烈参与”。这时的生态学已经开始其“本身价值取向的自我完善”，开始凝聚成一种新时代的世界观。^[2]按照余谋昌先生的说法，是启动一场“新的哲学转向”，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出现，乃至一种“新的文明样式”的诞生。^[3]

生态时代世界观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工业时代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如何看待“自然”一维，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还是涵盖了人的整体、母体？人类在宇宙间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人类是中心还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环？人类如何处

[1] [美] E. 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85 年第 10 期。

[2] 参见马世骏主编：《现代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前言、第 5 页。

[3] 参见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 章。

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是两相对立还是互为主体？在这些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上，生态时代的哲学与现代社会的主流哲学相比，全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与主张。如同全球化与人类纪是两种不同立场，以全球化为旨归的后现代与以人类纪为背景的生态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向，两种路向实则是很难兼容的。

尽管生态危机已迫在眉睫，历史的惰性使得地球人类的集体选择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从不同社会体制的博弈来看，已经积累三百多年经验的资本社会犹如一位善于幻化腾挪的九段高手，而初露萌芽的生态社会尚且处在蹒跚学步阶段。

四、生态社会与乌托邦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着眼，纵观人类诞生后 500 万年、100 万年、50 万年以及最近五千年的历史，发现人类正在接近一个重大“分叉点”，正面临一场新的生死抉择。他指出：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成了地球上“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1] 侥幸的是那种由启蒙理性铁打钢铸的“社会无限进步论”、“历史规律决定论”已经开始瓦解，历史前行的路向不再作为科学规律强加给人们，未来的路向正有待于人类自己的选择与实践。

那么，“生态社会”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一种选择吗？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可以视为生态社会的一位先知先觉。由于其“有机哲学”、“整体论”、“过程论”的独特视野及其在宗教与科学冲突中竭力为宗教辩护的立场，更由于他把上帝与自然视为同一位格，将“永恒的和谐”与“谐和的适应”定为终极信念，这使得他早在 100 年前对现代社会的剖析批判就已经透递出对于生态社会的种种期待。^[2]

步其后尘，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与科布（John B.Cobb, Jr）分别创立了他们的生态神学的社会学说，在他们看来，生态学的世界观就其深层而言必然拥有丰蕴的宗教内涵。

莫尔特曼提出“面向将来的末世论”，以人的“自然化”、“社会自然化”应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他强调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内在团契关系，由此看待上帝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试图为未来的生态社会提供一种“终极角度的根据和规则”。^[3]

[1]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 参见[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宗教与科学”、“对社会进步的要求”诸章节。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怀特海的社会生态学预见”一节。

[3] 曹静：《一种生态时代的世界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科布则更侧重在生态实践意义上关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的变革，其《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一书，已经为生态社会描绘出一幅蓝图：

在经济政治领域，科布反对以单一经济增长为核心，反对市场对政府的恣意操纵，反对由富人引领的奢侈性消费，一切经济政治行为都应当从“上帝创造物的共同体”出发，在上帝、世界与人类的有机整合中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个“共同体”，差不多等于“生物圈”、“生态系统”。

对待种族与阶级问题，科布一方面承认这是“共同体”中的现实存在，同时希望消除种种偏见，给种族之间的友好交往、阶级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创造积极的空间，以达成共同体内的多元共存。

在文化教育领域，科布更是直接继承了怀特海的精神遗产，反对将教育局限于为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实用人才”。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个体的自由、增进个性的深度，其中就不能不包括艺术与审美教育。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增进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在性与道德领域，科布主张灵与肉的统一，认可性的满足对于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正面意义，在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应该找到各种满足共同体需要、又支持人的满足并提供性享受环境的方式”。^[1]科布的长期合作者大卫·格里芬甚至倡导整个社会“女性化”，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充满温柔与爱意、同情与怜悯。

与怀特海式的神学生态社会构想相毗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英国当代学者、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教授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和美国当代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其中奥康纳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述显得更具体、更系统，也更有力度。

奥康纳首先检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的缺陷，“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的缺失。马克思缺少对自然界有机性、差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关注。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市场运作的洞察与批判，全都触及到资本与自然之间不可调解的冲突，而这正是当前世界性生态危机的症结。“资本”既然是“自然”最凶恶的敌人，那么马克思作为“自然之敌”的敌手当然地就成为“自然之友”。奥康纳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2]其结论是：

[1] [美]小约翰·B.科布：《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我们需要‘社会主义’，至少是因为应该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我们需要‘生态学’，至少是因为得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1]面对生态破坏酿下的社会危机，奥康纳重振自然之维，他不仅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同时也指向“以往的社会主义”。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中，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自然界的健全、稳定并行。马克思早年设想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最终整合，“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似乎就要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

除了上述关于生态社会的系统理论构建，崛起于民间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绿党（Green Party）、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orld Animal Protection）、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以及环保志愿者、极简主义者、原始主义者、徒步旅行者、山林修行者等等，似乎也都在为一个崭新的生态社会的诞生呼风唤雨、摇旗呐喊。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乐世界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间天堂一再遭遇挫折后，生态社会果然就是一个可以期待实现的新社会吗？

面对这一充满诱惑的美妙前景，现实的最终结论却是悲伤的。

思想家们关于生态社会的构想尽管不成熟，但比对当前人类深陷其中的生存危机，无疑富有前瞻性、合理性、优越性。但若实践起来，却寸步难行。从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1997年在日本京都、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变化会议，上百个国家政府首脑献言献策，各抒己见，却始终不能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将近半个世纪过去，环境的恶化仍在一路下滑。原因是一切关于生态问题的建议与构想，只要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的利益相抵触，便被一剑封喉。而要真正扭转当下的地球生态危机，社会经济就必须付出零增长或负增长的代价，就看得见的前景而言，这是绝不可能的。

现代人类已经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独自做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祈盼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改良当下生态状况的一切举措，都将流于空谈，甚至陷入新一轮的危机。英国自然资源经济学家朱迪·丽丝（Judith Rees）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生态学与经济学越来越紧密的纠缠，正在结成一个无法脱逃的罗网。“改革者面对的是所有那些从现有制度中谋取利益的人”，^[2]系统的惰性是巨大的，“由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存在，环境学家能否成功地扭转单纯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令人怀疑的”。^[3]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困局，就

[1]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页。

[2] [英] 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64页。

[3] 同[2]，第558页。

必须“重新构建全球经济系统”。鉴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幻灭，前景是悲观的。^[1]动真格的环境保护将会对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承受的。更不要说，对于那些经济上的垄断者、政治上的投机者，“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一个环境目标，不如说是一个抬价还价的策略或市场工具”。^[2]于是，朱迪·丽丝说，永远不要相信那些政客、经济学专家、神职人员对于现实的解释，宁可相信小说家们乌托邦之类的还乡话语。^[3]

关于生态社会的种种构想，对于强大的现代政治经济来说，或许只是一帘春梦，一场类乎小说家的白日梦，一个永远在地平线上隐约呈现的乌托邦！

马克·布洛赫说得好，乌托邦即人所渴求的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空缺。“空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缺处总是弥漫着最强的希望张力。空缺，是一个以“渴求”与“失落”为两极的“场”。因此，空缺处就凝聚了更多人的天性。一位当代哲人说：“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干枯，人间剩下的只是平庸不堪、绝望无计的荒漠。”他说的其实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态。

以往的社会曾经创生过多种类型的乌托邦：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科技的……为什么就不能有“生态型”的乌托邦呢？希伯来先知以赛亚曾设想，理想社会应是生态和谐的社会：沙漠将变成绿洲，干裂的土地将水涌如泉，“豺狼将与羊羔同居，豹与山羊同卧，狮子与牛犊同群，整个生物界将由一个孩童统领”。^[4]中国古籍《列子》中也曾描绘过类似的情景：“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5]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更是千古传诵的东方生态型乌托邦诗篇。当代学者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在他的《生态乌托邦》一书中对未来的生态社会作出这样的企划：政府的各级领导主要由女性担任，人们生活在小型的、分散的、被森林化的原野分割开来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高速电动车的运输体系将其联系在一起；水能、地热、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城市街道全都是林阴道，有树、有花、有蕨、有竹、有流水、有瀑布，水都是经过污水处理过的循环水；最尖端的电子技术得到符合人的天性的运用；人们通过祷告、诗歌和小小神殿等形式表达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分散化的共同体、扩展了的家庭自发性的活动、激情表达的自由无拘、

[1] [英]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7页。

[2] 同[1]，第570页。

[3] 同[1]，第423页。

[4] 《以赛亚》第11章第6节。

[5] 《列子·黄帝第二》

消解竞争本能的仪式化的游戏构成生态社会的文化习俗与价值特色。^[1]

这种诗化的乌托邦设计，并不比“未来学”某些科学幻想更加乖张，惯常却总是受到官员与专家的蔑视与嘲弄。但你不能否认其中“弥漫着最强的希望张力”，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主体的选择，一种精神超越现实的巨大能量。

如果从政治经济角度救治当下生态危机的努力注定将要落败，那么人类走出社会发展这一“死胡同”的机遇是否存在？

一线生机，还在于变革人类自身，在于唤醒人类内在的自然天性，在于人类精神对于现实物欲的飞跃与超升。

拉兹洛、科布和格里芬等学者多年来已经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呼吁，他们侧重从“自然”与“精神”的交集处考察工业社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的灾难，并希望通过人们自觉的选择，在“现代”之后开启一个“生态型的后现代”，建立一个既有利于自然生态养护又有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世界新秩序。

这也是我所关注的“精神生态”。

20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社会已经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了。当代文化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世界、人的内宇宙。开发人的精神资源，调集人的精神能量，高扬人的精神价值，促进人类健康良好的精神循环，帮助身处末世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转换”是否定，也是“超越”；是创造，也是飞升。就如同给困顿于污浊池塘中的鱼类插上精神的翅膀，像亿万年前由鱼蜕变的那只“始祖鸟”一样，从水面飞越树梢，飞上自由的天空。^[2]

[1] 参见[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2] 鲁枢元：《说鱼上树》，《光明日报》1994年12月21日；又见《猗猗言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